

文章编号:1002-980X(2007)10-0053-06

# 群体规范、集体行动发生与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蔡祥军, 章平, 李玉连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4)

**摘要:**特定群体面临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需求时,需要通过群体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因而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是共享资源治理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问题。本文从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群体规范对于集体行动实现的影响机制入手,在清晰界定群体规范的含义基础上分析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制,并且通过模型说明群体规范的内生性形成问题,从而完整的得出群体规范促进集体行动实现的一般性理论,以期对当今社会和谐治理给出政策含义。

**关键词:**集体行动;共享资源;规范;搭便车

**中图分类号:** F224.32; F062.6 **文献标志码:** A

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为,仅仅狭隘的理性行为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够实现。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个体必然选择搭便车、从而无法实现集体行动的结论,现实中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应该能够发现短期自利的决策长期来说对自己是不利的,因而具有现实理性的个体应该努力通过合作实现集体行动。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可以由交往式理性思考和进化性行为模式来解释的规范在集体行动实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分析。针对现实世界存在的大量集体行动实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引入到群体合作的集体行动当中来。

规范是建立在个体在给定环境中应当如何行动的共享信念基础上的标准行为<sup>[1]</sup>。因此,规范形成和实施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体的内在情感和价值观之上的共享信念。情感涉及偏离群体规范受到内在的诸如“羞愧、内疚以及自尊心受损等”心理性因素以及荣誉感、公平感等。内在价值观涉及行为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森所说的交往理性的个体行为必然包含“我应该如何行动?我应该做什么?”的选择<sup>[2]</sup>。显而易见,内在情感和价值观的形成都与人类的群体性生活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实现长期、整体的利益为行为的奖惩机制。因此,规范的实施

是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Reuben指出:“如果说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一个完全的集体行动理论,理论模型中的个体必须是心理上更加现实的个体,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群体性合作规范的内生性产生问题,也即个体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中能够遵循规范而且偏离规范受到惩罚的机制对于集体行动实现的作用。”<sup>[3]</sup>

近年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先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等目标,通过倡导区域性群体的合作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大的制度建构如“农村合作医疗”、“合作金融”等在政府的指导和参与下组织实施,更为普遍的一些群众性自发组织的诸如“社区维权”、“消防俱乐部”以及“行业协会的集体反倾销诉讼”等都属于此类群体性的合作问题,即通过群体内部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因此,集体行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规范问题必将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关注。

## 1 集体行动中群体规范的作用机制

在奥尔森之前,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事情以空气污染、国防等这一类纯公共品供给问题为核心,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它性造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供

收稿日期:2007-05-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573046);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2006028801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6SJB790001);江苏省研究生科技创新计划(XM06-143);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创新培养基金。

作者简介:蔡祥军(1964—),男,山东曲阜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个体决策与公共治理研究。

给问题,因而作为唯一替代的选择,政府如何通过强制的权力实现有效供给成为研究的主题。事实上,奥尔森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指出了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集体性物品的供给问题,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内部合作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诸如灌溉水资源的村庄自治、行业协会、业主自治等群体性合作实现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自愿合作现象。因此集体行动的研究视角转向了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群体性合作问题,也既特定群体通过群体内部的合作关系实现的集体行动来治理共享资源。

通过集体行动治理共享资源的主要内容就是治理成本的分摊和收益分享。但是由于共享资源的主要特征是治理收益的难以排它性,因而群体内的个体有搭便车的动机,这就是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搭便车问题是集体行动主要障碍的原因。所以 Fehr 指出:“诸如新鲜空气、团队产出这样的公共品供给问题的主要特征是群体内部消费的非排它性,即当公共物品实现时,所有成员都更好,因此需要群体成员分摊成本实现群体的公共物品。”<sup>[4]</sup> Elster 认为集体行动产生于多人合作的结果,应该用“在固定总成本下通过个体贡献扩散收益的特征来定义。”<sup>[5]</sup> 因此,集体行动的主要内容是群体合作实现治理成本的分摊以实现共享资源治理,简单的思想模型如下:

一个  $N$  个个体组成的群体存在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合作需求,共享资源治理所需的总成本为  $C$ ,投入总成本  $C$  实现的收益为  $Q$ 。由于是共享资源,一旦实现  $Q$ ,群体内每个个体获得的收益都为  $Q$ 。满足:(1)  $C > Q$ ; (2)  $NQ > C$ 。

条件(1)表明单个个体不愿意独自承担起治理共享资源的任务,而条件(2)表明共享资源治理是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因此,成本分摊的集体行动本质是多人“囚徒困境”。从单个个体的合作意愿来看,简单的关系见图1。

由于  $NQ > C > Q$ ,必然存在  $n^*$ ,  $1 < n^* < N$ ,使得  $\frac{n^*}{N}Q = C$ 。因此,从图1和上式可以看出,每一个个体参与共享资源治理的行为选择依赖于其他人是否参与的预期。因而在现实生活中,要使得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得以实现,就必须满足群体内至少达到阈值条件的人数参与,只有预期到超过阈值人数的其他参与者存在,成本分摊使得收益超过成本,个体才会自发参与。Baland & Platteau<sup>[6]</sup> 指出,“确实,在通常的场景中,即使是最大收益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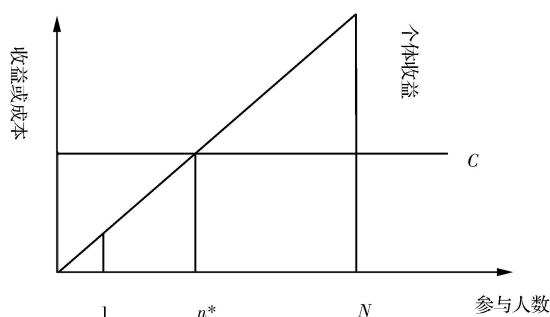


图1 共享资源治理中个体收益与参与人数的关系

也不会单独采取行动,因此,集体行动的实现涉及个体确信至少有阈值  $N$  个其余个体参与的条件,自身的参与才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因此,现实的问题就转为可置信承诺问题”。可见,共享资源治理收益的难以排它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的普遍存在,而理性的个体预期到这一情况就造成“囚徒困境”的结果。而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实际案例表明,必然存在某种机制解决可信承诺基础上的预期问题。

在现实世界,围绕共享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是一个基于群体内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场景,而非传统研究的“匿名”个体间的“自愿捐赠”场景。也就是说,面临集体行动行为选择的个体不是处于隔离的、被分别关在黑屋子中的“囚徒”,而要是是具有地缘关系的群体,如乡村、城市小区;要是是具有经济或者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群体,如行业协会成员、校友会等,总之是可以面对面沟通、交流、谈判的。而正是在群体内长期交往而非匿名的场景,建立在情感和价值观基础之上、以互惠为主要特征的群体规范才在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青木指出:“当交换以多边的形式发生在相互认识的一群固定的参与人中间时,我们称之为社区,他可以是乡村、商人社区或者职业社区,这些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规范的产生。”<sup>[7]</sup>

总之,现实中的集体行动问题是基于可相互交流和协商场景中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的群体合作问题,个体的行为选择建立在参与或者不参与情况下的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之上。因此,合作实现问题也就转化为:参与和非参与行为的奖惩机制实现的个体参与的收益大于搭便车。而在市场机制无法提供货币激励的情况下,群体规范提供了替代的奖惩机制。

关于群体规范的奖惩机制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方机制主要是个体内在情感的自我奖惩。个体违

背群体规范将导致内心的不安, Elster<sup>[5]</sup>主张: 社会规范影响的行为由准内在动力所推动, 遵从规范通过内疚感等维持。许多情况下, 我们自然的激励去“做正确的事”, 而当我们没有做或者没有成功时我们通常会感到糟糕或者负疚感。Gintis 同样认为, 偏离群体规范受到内在的心理因素惩罚, 诸如“羞愧、内疚以及自尊心受损等。”<sup>[8]</sup> 第二方惩罚机制主要是受到违背规范损害个体的直接报复性惩罚。Fehr and Fischbacher 经过现实观察认为: 规范违背的直接效应是明显的, 但是第二方惩罚的单独作用无法维持规范的长久性, 因为社会生活中很多情况下非直接可察觉的违反规范, 因此当事人可能无法实施直接的报复, 因此, 他们认为规范实施还需要第三方惩罚机制。第三方机制是指没有受到损害的群体内的其他人给予的奖惩。理解第三方惩罚的性质就是理解一个流行短语“发生在村庄”, 即合作规范的实施通常要求松散的网络中一个利益不相关者的干涉, 这样的松散网络对于村庄而言是普遍的<sup>[9]</sup>。在集体行动治理共享资源中, 偷懒行为的有效识别以及给予的惩罚是重要的内容, 这就要求群体成员自发的关注普遍合作性参与的执行, 对于不参与者的识别信息在群体内传播, 从而得以实施集体性惩戒。

因此, 引入群体规范将改变个体的收益与成本结构, 使得搭便车的成本大于收益, 从而有利于实现集体行动。假设群体规范实施的惩罚为:  $c_1$ 。若假设已有  $n$  个个体参与且实现治理共享资源, 个体  $i$  选择搭便车时, 收益为  $Q - c_1$ 。个体参与的收益为  $Q - C/n + 1$ ; 因此, 只要满足  $c_1 > C/n + 1$  条件, 则个体就会放弃搭便车行为而自发参与。可见, 群体规范的存在起到的作用是: 一方面促使个体自身参与, 另一方面个体也会提高其他人参与的预期, 因而可能形成普遍参与的结果, 这就是群体规范实现集体行动参与的作用机制。

总之, 群体规范的存在使得合作参与的行为选择成为隐含、默认的行为模式, 每一个个体能够预期到群体内有超过阈值条件的个体参与, 因而会主动和自愿参与。因此, 群体规范的作用机制就是基于内在情感和价值观、依靠三种奖惩机制建立起的共享信念支撑的合作性行为模式, 共享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体参与的激励于约束机制, 从而实现共享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Baland & Platteau<sup>[10]</sup> 强调了社会规范在维持群体性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规范一方面限制个体的策略集以避免个体选择欺诈

和偷懒等行为; 另一方面, 群体规范型塑个体的偏好使得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内在要求保持一致。因此, 群体规范的作用实际上是“群体成员通过分享的共同风气联系在一起而使得合作的可能性被提高”。因此, 许多集体行动文献认为, 社群组织的集体行动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益于合作的社会规范的存在或缺失。

## 2 规范的演化机制

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接受规范的存在以及至少在有限的局部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从现实社会的观察来看, 社会规范是无处不在的, 人类行为无疑受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文化以及价值观等影响。但是在把群体规范是看作历史、基因或文化的外生性制约因素而影响个体决策和行为, 还是把它理解为内生的、自我实施的社会结构、通过群体内部个体策略互动而产生并自我维持上存在争议。传统的经济学家要么忽视规范的存在, 要么视为文化或基因等先天决定。近期, 随着博弈均衡思想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内生性。认为规范的基本性质应该理解为内生的、自我实施的社会结构, 他通过人们的策略互动而不断再生, 而不是把规范看作历史和文化赋予的外生性约束因而恒定不变。

群体规范作为共享信念基础上的行为模式, 必定与特定群体和特定的行为治理对象联系在一起, 比如市场中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交易规范; 在共享资源自发治理领域, 针对不同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要求不同的群体规范。但是所有群体规范都是群体内部个体间长期交往过程中演化而成的, 也就是说, 规范的形成以及个体遵循规范同样是个体的理性行为结果。因此, 虽然我们认为共享资源自治领域需要群体规范治理个体行为, 但是并不假设群体内个体先天具有公共目标或价值, 他们仍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 即个体在预期群体内其他人行为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收益最大的行为或策略。因此, 当我们分析规范的形成以及个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遵循规范的时候, 必然存在奖惩机制使得规范得以演化形成并且得到维持。不同于市场机制中的纯私人收益实现的奖惩机制, 关于规范治理行为的奖惩机制目前普遍认为是互惠合作实现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即所有的规范具有的共性是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 而群体规范的形成与演化正是在群体内互动交往的互惠合作中内生性产生, 并且依靠个体的利益增进原则得到维持。我们

结合青木昌彦的关联博弈思想讨论社区规范在村庄灌溉系统的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来分析互惠合作与群体规范的演化以及如何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

假设: 有两个分别有  $N$  个农户的村庄, 每个村庄内原先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 原先主要依靠自然河流和雨水灌溉。经过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以后, 村庄内农户都逐渐意识到需要修建灌溉水渠来保障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假设灌溉水渠建立所需的总成本为  $C$ , 投入总成本  $C$  每个农户实现的收益为  $Q$ 。满足: (1)  $Q < C < NQ$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灌溉水渠一旦建立, 很难排除不参与修建农户的使用。

可见, 将有待建立的灌溉水渠视为共享资源, 显然, 每一个农户都不愿意承担成本而只愿意享受灌溉水渠修建后的收益, 即搭便车。因此, 村庄修建灌溉水渠应当视为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集体行动问题。因此, 尽管每个农户分摊成本治理灌溉水渠对每一个农户的长远利益来说都是有利的, 但是搭便车动机使得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灌溉水渠的修建难以实现。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难题, 但事实上有很多村庄很容易的解决了上述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群体规范, 即依靠内在情感和价值观, 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群体规范实现信任与合作关系。

因此进一步假设: 在村庄 1 内农户间交往较少; 而在村庄 2 内, 由于历史事件等原因内部交往密切, 因而逐渐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互惠合作收益。因为对于村民而言, 时常需要其他一些相互的帮助, 比如节日活动、农忙时的互助、盖房子或家人生病等特殊困难时期, 这一类的互惠合作类似于相互识别基础上的“俱乐部”, 是对外排它的。与此同时, 经常的互惠合作式交往建立起群体内部的情感, 这一情感与一部分经济学家谈及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相关, 即身份的共享或视自我与某一特定群体的其他人是一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情心、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同时, 交往式理性能够使个体认识到依靠互助合作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长远利益的关系, 从而演化出个体认同群体内部的互惠合作以及上升为公共参与精神的价值观。可见, 基于日常的交往能够演化出以情感和价值观为基础, 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群体规范。在共享资源治理领域, 群体规范的具体内容以相互信任与合作、不偷懒、传播偷懒者信息以及实施孤立等惩罚、尊崇热心公益事业者等等。

因此, 在村庄 2 内, 通过互惠合作建立起的规

范, 要求个体之间加强交往、互相信任、不偷懒, 一旦上述行为准则成为所有个体的信念和预期, 就形成共享的行为模式。这种共享的行为模式一旦建立, 个体预期到违背规范的损失, 从而能够实现  $c_1 > C/n + 1$  的条件, 因此村庄 2 内能够实现自愿参与的集体行动从而实现灌溉水渠的自发治理。而在村庄 1 内, 因为没有演化出群体规范, 无法实现相应的奖惩机制, 因而搭便车是每个个体的必然选择。可见, 群体规范成为共同参与的可靠承诺机制。

可见, 群体规范的演化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 只有互惠合作基础上的相互交往才能演化出人类特有的情感和价值观问题, 而情感和价值观进一步支持互惠合作式的交往, 从而使得信任与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共享的行为模式, 进而固化为个体的惯性性行为, 从而在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中实现普遍的参与。

强调互惠合作的内部交往与规范的形成具有的关联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 群体规范的演化是有条件的, 偶然因素的存在导致的初始条件以及其后环境能否实现和维持互惠合作关系等都决定了其后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汪丁丁所倡导的在制度分析中遵循哈耶克特定知识的传统。某个群体会因为“偶然的事件”演化出特定的协调机制, 进而伴随组织等结构的变化, 形成集体惩戒机制等连锁反应。因此, 因为“任何习俗、惯例、制度等形式都有一定的伦理和道德基础, 即伦理和道德对习俗和惯例的生发、型构和变迁起一定作用, 反过来看, 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准则又是习俗、惯例等的伴生结果”<sup>[11]</sup>。因而群体规范的演化必然与特定群体的历史以及具体的环境结合在一起, 同样理性个体组成的群体会因为历史事件以及各自的环境形成不同的规范。

其次, 群体规范的演化中存在理性的作用。由于通过集体行动来治理共享资源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长远上的统一, 依据理性作为“合理审视”的原则, 群体内长期交往能够演化出有利于实现集体行动的合适的共享行为模式, 既群体规范。也就是说, 具有现实理性的个体能够看出一些“合适行为”对于共享资源治理的作用, 因而能够通过互动解决群体内普遍关心的行为问题。所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从行为合理性角度探讨规范治理行为问题。认为: “一个规范比较理性意味着得到所有接收者的承认, 因为他解决了他们共同关心的行为问题, 因

此,规范不仅具有‘认知情结’,还具有一种‘动机情结’。“正是理性的力量,使我们能够考虑我们的义务和理想,以及我们的利益和优势”。并且指出,“不在于是不是把情感和态度看作重要的,而在于这些情感和态度是不是(并且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受到理性活动的影响和培养”。<sup>[12]</sup>可见,群体规范演化过程中同样有理性的培育力量。

总之,群体规范是群体内个体间长期互动交往的演化结果,依靠人类特有的情感以及价值观为基础,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群体规范的演化具有强“路径依赖性”,一个群体演化出特定的规范与初始的历史事件有关,在其后的具体场景中与组织结构演变交织在一起,并且与情感和价值观相伴生。因此,当我们对特定群体进行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现象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识别出群体有没有存在特定内容的群体规范以及群体规范对于集体行动实现的影响机制。至于群体规范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从特定群体的发展历史中,结合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进行细致的分析。所以 Ostrom 指出:“(集体行动)未来的实证和理论工作需要寻求场景变量以能够解释培育和唤起社会规范的过程,这些规范以内在方式告知了其他人可能的行为,以互惠、信任和公平等为主要内容奖励这些行为并固定化”。<sup>[13]</sup>

### 3 结论与意义

既然人类是以群体性生活作为主要的特征,不同于匿名的、孤立的个体行为,群体生活的长期交往形成的群体规范必然包含“合适性”行为的自我审视。因此,除非我们理解和分析社会规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人类合作关系背后的特征和驱动力。由于共享资源的自治管理是通过群体合作的集体行动来进行的,因而群体规范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群体规范以内在价值观、情感为基础,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因而在以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为主要内容的集体行动实现和维持中充当个体的参与激励与约束机制。同时,作为非正式制度内容的群体规范是内生的演化结果,群体规范的演化需要从群体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是理性个体依靠互惠合作式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与组织结构以及情感等因素的演变交织在一起,因而具

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期的国家而言,很多领域需要自发的集体行动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无论是传统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还是新出现的城市社区的自我治理以及行业的反倾销应诉的集体行动,这些都需要群体性的自发合作实现共享资源治理,因而这一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群体规范在共享资源社群自治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这个一直被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研究主题必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ERNST FEHR, SIMON GACHTER. Reciprocity and economic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homo reciprocan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 845 - 859.
- [2]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3] ERNESTO REUBEN. The Evolution of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 Master Thesis, Tinbergen Institute, 2003.
- [4] ERNST FEHR, GACHTER.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umans [J]. *Nature*, 2002 (415): 137 - 140.
- [5] ELSTER. The Cement of Societ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6] BALAND, PLATTEAU. Wealth In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Commons, Part II: The Regulated Case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8, 50 (1): 1 - 22.
- [7]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 [8] BOWLES, SAMUEL, HERBERT GINTIS.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y: Structured Pop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Norms [J].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1998, 19 (1): 3 - 25.
- [9] FREDERIC GASPART, JEAN - PHILIPPE PLATTEAU. Heterogene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for effort regulation: lesson from the senegalese small - scale fishe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2 (57): 189 - 197.
- [10] BALAND, PLATTEAU. Wealth Inequality and Efficiency on the Commons - Part I: the Unregulated Case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7, 49 (3): 451 - 482.
- [11] 韦森. 经济学与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2]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3] ELINOR OSTROM.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 (3).

## Group Norm, Collective Action Happening and the Co-governance of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CAI Xiang-jun, ZHANG Ping, LI Yu-li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 & Tech.,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 Collective action is community cooperation to governance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so the key is the share of cost and profit in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self-governance. But all actors want to free-rider because the benefit is nonexclusive.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collective ac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it can be true base on norms which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Norms encourage cooperation action and punish non-cooperation action. All these compose the mechanism for collective action to achieve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This article gives a model to show how norm can be shaped from intercommunication. So offer a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of community norm.

**Key words :** collective action; norm; free rider; common pool resource

(上接第 28 页)

为负的贡献,只有在 2005 年为正;<sup>4</sup>基本都为正的贡献,只有在 2005 年为负。这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前 5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又过低,并且股权在第 2 至第 5 大股东的适度集中有利于经营绩效的提高。关于股权集中度的检验结果基本与研究假说相一致。<sup>5</sup>在 5 年中都为负,且都显著,证明商贸行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经营绩效的增长是负贡献的,即我国商贸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已经超过了最优的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偏高,这与研究假说是不一致的,这是由于行业因素的影响,以及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代理问题带来的代理成本加大或破产成本增加所致。另外,控制变量的系数中,<sup>6</sup>在 5 年中都为正,且除了 2003 年之外,其它各年都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商贸行业公司规模扩大可带来规模经济,有利于经营绩效的提高;<sup>7</sup>接近于零,且统计上不显著,表明董事会规模与经营绩效基本无关。

## 5 结论

目前我国商贸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明显的逐年递增趋势,并且资产负债率偏高,超过了最优

资本结构,这与国内外一些研究有些不一致,原因在于商贸行业因素的影响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问题所致。从资本结构诸因素来看,长期借款率对经营绩效的贡献率为正,短期借款率对经营绩效的贡献率为负,尽管短期借款率呈现逐年递减趋势,但是我国商贸企业短期借款水平多年来一直偏高,造成对长期借款的替代,容易导致财务杠杆为负效应;而股权在第 2 至第 5 大股东的适度集中有利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 参考文献

- [1]韩传模,孙青霞.中国资本结构实证研究方法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6(9):42-47.
- [2]路正飞.企业适度负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6(2).
- [3]王娟,杨凤林.上市公司筹资结构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6):23-28.
- [4]吴淑琨.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 U 型关系研究——1997-2000 年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2(1):80-87.
- [5]李锦望,张世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2):32-35.
- [6]MASULIS RONALD W. The impact of capital structure change on firm value: some estimate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83,38:107-126.
- [7]胡援成.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研究[J].金融研究,2002(3):110-122.

## The Impact of Chinese Public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Change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 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Companies

MA Lin-mei, WANG Zhi-hong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Huludao Liaoning 125105, China)

**Abstract :**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s empi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pit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the commercial companies and gets the result: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capital structure is beyond the best point;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has in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term loan ratio, but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short-term loan ratio is still remarkably exist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equity is propitious for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Key words :** capital structure; financial lever; equity concentration degree; corporate performance